农业保险系列报道

种植业不能再看天吃饭

本报记者 刘 慧

开展种植业农业保险是应对种植业自然灾害的有效手段，我国自从2007年试点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种植业上了一道安全阀，让农民在遭遇自然灾害后，不至于因灾返贫，有能力迅速恢复生产，有利于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今年吉林洪涝灾害较多，德惠市朱城子镇哈拉哈村家庭农场主周延武家种植的4000多亩玉米，有30多亩玉米地绝收，损失高达30多万元。让他稍感安慰的是，今年他在中航安盟保险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投保了农业险，缴纳保费1.2万元，能够获得保险理赔，减少损失。据了解，中航安盟吉林分公司已经组织专家勘查定损，希望尽快把理赔款送达受灾农户手中。

我国是一个种植业大国，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种植业在生产过程中易受到旱、涝、风、雹等气象灾害影响，造成一定损失，平均每年约有3亿亩农作物受灾，2亿多农村人口受到灾害影响。种植户的抗风险能力很差，常常要面对因灾返贫的困境。种植业保险是有效补偿农民财产损失，帮助农民恢复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

种植业保险是农业保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农作物为保险标的，为因暴雨、洪水、内涝、风灾、雹灾、旱灾、冰冻造成的保险标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我国自从2007年中央财政首次在内蒙古、吉林、江苏、湖南、新疆、四川等6省区开展保费补贴试点以来，经过6年多发展，逐步构建起市场化的种植业生产风险保障体系，保险标的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12年底，中央财政补贴的省份已扩大到全国所有省市，补贴农作物品种包括玉米、水稻、小麦、油料作物、棉花、马铃薯、糖料作物、青稞、天然橡胶等。根据保监会的统计，2012年我国农业保险承保农作物9.7亿亩，占全国播种面积的40.2%，较2007年提高了近5倍。

种植业保险灾害补偿功能和作用推动了农业生产自然风险的社会化转移和分散，有力支持了农业灾后恢复再生产。

农户投保两种思维

经过几年的推广，农民的保险意识逐渐提高，投保积极性逐渐增强，由“要我投保”逐渐向“我要投保”转变。但是，在种植业保险推广过程中仍然存在两种现象：小农户还存在“靠天吃饭”的思想，投保意识淡漠；种粮大户或农场主投保的积极性很高。小农户与种粮大户或家庭农场主长期并存，并在很长时间内还将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是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也是保险公司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记者在各地调查发现，小农户投保意识淡漠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农村土地经营规模普遍很小，分布零散，农户通过多样化种植、间作套种、借贷、出租等形式，能够实现农业风险的自我调节和分担，降低灾害损失的经济影响。二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相对较高，农业经营性收入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即使遭受灾害损失，也不会对生产经营和家庭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农险补偿收入的预期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三是部分小农户耕作经验丰富，对自己耕种的土地会不会发生灾害掌握的很清楚，会出险的要求保险，不会出险的不愿保险。四是有的农民对理赔要求过高，在被保险公司合理拒赔或没有达到自己认为应赔的数量后对保险产生了不信任感，影响投保积极性。

与小农户不同，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主对农业保险的需求非常强烈，投保积极性很高。这是因为他们种植规模大，有的达到上千亩甚至上万亩，面临的生产经营风险自然很大，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又是他们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旦遭遇极端自然灾害损失，可能会倾家荡产。投保农业险不仅能够给他们带来物质上的保障，更带给他们心理上的保障。

提高保额势在必行

种植业保险使广大受灾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风险保障，但是，种植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保障水平和覆盖率低、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农民反映最多的是目前保险业务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理赔金额太低，赔偿金额远远不能赔偿农民的投入成本，保险的保障功能体现不出来，影响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我国现阶段种植业保险选择的是以保障农户再生产能力为主的成本保险，只保农业生产成本，不保收益和产值，主要是担心农民承受不起高额的保费，各级财政没有保费补贴能力。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经营成本的快速上升，2007年制定的保险条款规定的保险金额已经涵盖不了农民的生产成本。以吉林玉米为例，按照规定，玉米保险的物化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机耕和地膜等生产成本，保险金额为3000元/公顷。根据农场主周延武估算，今年1公顷玉米生产成本，种子4000元至4500元，农药150元至400元，再加上人工、机械投入，共计投入7000多元，如果加上租地成本，投入更高。目前的保险理赔金额远远不能补偿生产成本。

现在的问题是地方财政无力承担保费补贴资金，提高农业保险赔偿金额，对于农业大省和农业大县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按照现行规定，种植业保险结构是中央财政补贴40%，地方财政补贴40%，农民自交20%，其中各级财政分担比例为中央40%、省25%、县级15%。现实情况是农业大省和农业大县基本都是财政穷省和财政穷县，随着种植业保险的快速推广，农民投保积极性增强，已经给地方财政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一些地方不得不限制农业保险的投保面积。

中航安盟保险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总经理左愚认为，目前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对于农业地区来说不太合理，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财力情况，确定中央和地方财政保费补贴的分担比例，提高中央财政的分散比例，提高经济强县的分担比例，降低欠发达县的分担比例。同时增加对农业大省和农业大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切实解决农业地区种植业保费补贴资金难以到位的问题，保护农民投保的积极性，使种植业保险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采访札记

找到利益平衡点

今年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给农民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然而，因为有了种植业保险，有的农民获得保险理赔，灾害损失得以补偿；有的农民因为地级差，保险公司没有接保，必须自己承担全部损失。

吉林省扶余县三骏乡郎郡村农民吕艳秋告诉记者，她家有38亩低洼地，今年种植的15亩玉米和23亩花生，全部被洪水淹没，绝收已经定局。按照保险公司规定，低洼地不属于承包范围，她的投保要求被保险公司拒绝了，她得不到任何补偿，这让她很无奈。据了解，像她这样因为地级差被拒保的农民在全国不在少数。

对于农民来说，从自身耕作经验出发，他们只愿意投保地级差的地块，不愿意投保地级好的地块，这无可厚非。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担心赔付不起，按照地级差异设置保险范围，地级差的不允许参保，地级好的允许参保，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有选择性的设定给农民造成了保险公司只想赚钱、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感觉，影响农民投保积极性，是导致种植业参保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破解这种困局，需要保险公司与农民寻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保险公司应该扩大保险覆盖面，按照风险区域制定保险费率，不是简单地按照地级划定保险范围，并把地级差的地块直接排除出保险范围。农民也应该理性看待农业保险，放弃侥幸心理，把农业保险作为风险保障的重要手段，积极投保。这样，双方才能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寻找到双方利益平衡点。

乡村教师的坚守

左图：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长凝镇东长凝小学的学生张晓伟拿着自己给范妹锁老师写的信。

右图：范妹锁老师在给孩子们上课。

1985年，20岁的范妹锁被分配到大山深处的永红沟小学任教，2012年，27年的坚守奉献为他换来了一名教师的至高荣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畜禽养殖走向规模化

本报记者 乔金亮

今年以来，牛羊肉供求关系紧张，价格持续高涨。

“牛羊肉价格近两年呈加速上涨态势，市场机制对牛羊养殖的拉动效应在不断增强，我们要以肉牛肉羊为重点，大力发展规模养殖，增强牛羊肉市场供给能力。”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专家曹兵海说，农区要注重发展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着力提高母畜繁殖性能，大力开展牛羊杂交配套生产模式；牧区要注重发展现代家庭牧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牛羊舍饲综合配套技术，优化配置草地资源与牛羊存栏规模，推广适度规模经营。

在散养户加快退出的情况下，规模养殖成为保障畜产品供给的重要支撑力量。2012年，全国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化比重达38.4%，比2007年提高16.6个百分点；存栏100头以上的奶牛规模化比重达37.3%，提高了20.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规模养殖的良种化水平、饲料转化效率、饲养管理水平等有较大幅度提高。

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这几年规模养殖发展，得益于政策扶持和社会投入相结合，近5年中央扶持资金共135亿元，今年3月底金融机构对畜牧业贷款余额达3000多亿元，增强了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部省联动开展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共创建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场3178个、省级示范场近1万个。

当前畜禽养殖规模化水平提高较快，但规模养殖固定投资较大、成本回收较慢、风险相对较高，新建养殖场用地瓶颈进一步加大，中等规模养殖场户贷款问题难破题，规模养殖水平与建设现代畜牧业的要求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首先，畜种间发展不平衡，肉牛肉羊规模化水平明显滞后。蛋鸡和肉鸡已基本实现了规模化，生猪和奶牛规模化进程推进较快。相比之下，肉牛肉羊饲养周期长、比较效益低，各级政府政策支持力度总体偏弱，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仍处于起步阶段，基础母牛更是以千家万户散养为主，已成为制约肉牛肉羊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硬件与软件不同步，精细化管理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大规模养殖企业普遍采用了自动喂料、自动饮水等设备，个别中小规模养殖场户的圈舍标准也高于实际需求，但精细化管理方面明显不足，部分规模养殖场片面认为装备现代化就是生产标准化，在设备设施更新改造上不惜血本，而生产过程没能按标准化生产。

再次，生产与市场不对接，养殖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利益分配不均衡，风险最大的养殖环节平均利润率较低，产加销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尚未全面建立。

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王智才说，今后发展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要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的要求，围绕主导畜种，突出肉牛肉羊，强化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全面推进畜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良种是标准化规模养殖发展的先决条件，要以良种繁育推广为根本，不断提高良种化水平。“现有扶持政策要优先支持饲养基础母畜的规模养殖场户，努力遏制基础母畜存栏连续下滑的势头。”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支持种畜禽场，特别是肉牛、肉羊种畜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良种供应能力。要重点扶持母牛、母羊良种繁育，积极争取地方政策扶持，引导鼓励大型屠宰加工企业建立母畜养殖基地。

目前，各地出台举措着力推动标准化规模养殖，增强牛羊肉综合生产能力。重庆和新疆等地出台了扶持牛羊生产发展的专项资金。青海省启动牧区能繁母畜补贴试点，保护牛羊养殖积极性。甘肃省重点扶持50个牛羊产业大县建设，每年整合省级专项资金1.5亿元。

基层连线 JICENGLIANXIAN

甘肃肃南县：

抱团经营增收快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武雪峰

“过去我家种植养殖的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2010年加入圈坡小杂粮专业合作社后，种了30亩地，前两年，每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现在的收入能翻一番。”像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藏族乡牧民陈宝德一样，依托专业合作社发展种植养殖、乡村旅游，已成为肃南县农牧民创业致富的新途径。

“过去，农牧民分散经营、单打独斗，增收致富步伐缓慢。如今，随着合作社的兴起，农牧民抱团经营，生产上了规模，掌握了市场主动，形成了特色产业。”肃南县农牧委主任贾生辉说，许多农牧村依托本地优势农畜产品资源组建的各种专业合作组织不断涌现，实行“合作社+基地+农牧户”或“企业+合作社+基地+农牧户”的运营模式，带动优势产业20多个，初步形成了“一村一品”或“几村一品”的竞相发展格局。

大岔村依托本村高原牦牛资源，组建了祁连山牦牛专业合作社，去年生产高原牦牛肉20吨，总产值达到100万元，产品远销新疆、内蒙古、河南。“今年打算再建一座20多吨的冷库，争取生产规模在去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大岔村村主任安自成说。圈坡村的小杂粮专业合作社已由昔日的小作坊变身大厂房，合作社负责人陈少雄介绍说，新厂房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比原来的大5倍，新购置的7台新型设备已投入运营，月加工能力达4万多公斤。

肃南县通过争取项目、社员自筹、地方配套、信贷扶持的多元投入机制，扶持农牧村专业合作社做大做强，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解决发展资金150多万元，提供财政贴息贷款50多万元。目前，肃南县共建成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61个。

山东金乡县：

农民生活有保障

本报记者 吉蕾蕾 通讯员 高同建

拿着报销的医药费，山东省金乡县肖云镇代庙村村民徐福军老人别提多高兴了。“原来政府动员俺参加新农合，俺还半信半疑，这有病了才知道真管用。”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今年春天他生病住院治疗花了3万元，报销了2万多元，“这要是搁以前，谁能想到看病不仅能报销，并且还能报这么多啊！”

山东省金乡县坚持把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工作作为核心工作来抓，在贯彻执行国家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落实“三提三扩”，即提高医疗卫生保障水平、困难群众救助水平和社保资金使用透明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医疗救助范围和就业扶持渠道。

据了解，为加大社会保障投入，金乡县财政拿出1.5亿元专项资金提高医疗卫生保障水平。其中将新农合筹资标准由每人每年300元提高到350元，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24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280元，将城乡低保对象住院费用个人负担救助比例由10%提高到30%，农民群众看病就医问题得到有效保障。同时，金乡县财政拨付资金2000万元提高困难群众救助水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农村五保供养集中供养标准均大幅提高。金乡县还利用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积极宣传国家惠民政策，严格执行社保资金拨付、使用公示制度，接受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

农情日记

宁夏蔬菜供香港

8月29日，宁夏立岗镇党委副书记于裕岭带领我们参观了位于兰光村南边的兰星村、银星村农业发展情况。

兰星村的500亩西红柿生产基地，是为供港订单生产的，年初签好协议，包产包销，一等果每斤不低于0.7元，二等果按市场价格收购。“按照公司生产标准，一棵西红柿只允许保留5盘果，每盘只允许挂4个果。但在西红柿生长过程中，技术员看到田间长势较好，就自作主张多留了1盘。西红柿产量虽然略有增加，但由于果实大小达不到预期，不符合港商一等果的收购标准，本来每斤市值应当在0.7元以上，结果仅以0.3元的价格随行就市销售。介绍情况后，于书记痛心地说：“标准就是标准，一点都不能打折扣，教训是惨痛的。”

银星村的现代化蔬菜种植园地，是被瑞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反租倒包的，近3000亩，多为广东菜心、奶白菜、小白菜等绿叶蔬菜，专供香港。这里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又少，蔬菜品质高，深受香港市民的欢迎。据于书记说，一亩地一茬约生产800斤至900斤蔬菜，一年可以种植5茬，年亩产蔬菜4000余斤。

虽然企业的收益是可观的，但村民们只能得到每亩800元的土地流转费用，少数技术优良的年轻村民能在企业打工赚到合理报酬，村集体没有参与企业的利益分配，不能实现发展共享。那么村集体不流转给企业，自己种植蔬菜的道路可行吗？困难还是比较多。一是村集体的融资能力有限，不能大规模地投资基础设施如冷库厂房等；二是高级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不够；三是缺乏销售渠道，产品再好，销不出去就只能烂在地里。如何从企业经营中吸取经验，取长补短，是村集体经济今后发展的关键。（农业部宁夏调研组）

本版编辑 刘 佳